

羞于承认的 “中国记者之父”



文化人

齐鲁晚报

B04

编辑：陈熹 美编：石岩 组版：洛菁
2015年1月23日 星期日

最近一段时间，记者的日子很不好过，“人人都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骂记者15分钟”。似乎姚贝娜的死，庞麦郎的惊惶，余秀华的走红，都是记者一手造成的。这些争论暂且按下不表，今天我们单纯聊聊历史，记者这个行业，是怎么进化来的？他们，喔，我们，该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记者从诞生之初就被偏见笼罩，地位还不如现在。在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这个职业从不入流的“文人乞丐”，到举国趋之、帝王之师、国士礼遇，一步步挣得了地位。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记者进化史—— 从“文人乞丐”到自诩国士

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是近代第一位新闻大师。他一生创办了二十多种报刊，一手造就了维新变法时期最有名望的报刊——《时务报》。

《时务报》有点像梁启超一人开的原创公众号，每期两万多字，都是他一个人撰写、编辑，有点儿像今天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期刊的郑渊洁，当然啦，题材不同。

《时务报》创刊号发表了大名鼎鼎的《变法通议》，因思想新鲜、文风活泼，梁启超一炮打红，赢得粉丝无数。

当时不少新潮的督抚大员，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两江总督刘坤一都是梁启超的订阅读者。后来梁启超回顾曾经的壮举，自我表扬曰：“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梁启超是个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他的学生梁实秋说，他演讲到紧张处，手舞足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

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梁启超的文风也是昂扬激愤、纵横驰骋。在语言上，夹杂俚语甚至外国语言，早期报纸的酸腐之气一扫而空，开创了独特的报刊文体——时务文体。现在新闻报道的文体和话语，都是由梁启超而起。

他的粉丝之一，近代报人、小说家包天笑说过：“《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梦……他（梁启超）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欲说的一般。”他的挚友黄遵宪说梁启超的文字：“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可见，梁启超真是舆论大师。

辛亥革命前，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出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报刊取代梁启超的改良派成为主流，黄侃、于右任等报人风靡一时。但这些人更多被称为革命报人，而非记者，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舆论监督，最次才是报道新闻、传递信息这些最基本的新闻职业功能。

邵飘萍 毛泽东的新闻老师



面对民国时期新闻业党同伐异、敲竹杠的堕落状况，一份新生报纸喊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宣誓自己经济独立，不受政治、利益集团操控。这份报纸就是后来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报纸奖的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是评论高手，下笔嬉笑怒骂、句句如刀，他从袁世凯骂到段祺瑞，都是当局最高长官。然而，他做人和蔼、敦厚，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风度。

张季鸾的继任者王芸生说：“先生（张季鸾）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证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

对张季鸾，蒋介石确实是以国士待之。蒋介石在军阀混战时期，曾通过合纵连横铲平不少大小山头，然而，对张季鸾他一向礼遇有加。他每年都请张季鸾到他的庐山别墅度假，不经通报，张季鸾可以直接见他，或者打电话。1934年，蒋介石大宴群僚，数百高官显宦云集一堂，

真正的职业记者出现在五四时期，以黄远生、邵飘萍为代表。也正是有了他们，记者才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邵飘萍在《申报》做记者时写的新闻特稿“北京通信”名噪一时。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书中说，邵飘萍追求奢华生活，讲究排场，客厅陈设极其豪华，连香烟都是特制（上有“振青”字样），出入坐小汽车，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这样的支出单靠办报无法应付，所以接受权贵的“馈赠”不可避免。不过，也有人说，如果没有这等排场和架势，在民国初年也不可能受到政坛要人的重视，也就很有可能没有那些独家政治新闻。

邵飘萍的死让人唏嘘。他对奉系等军阀一向看不惯，曾撰文骂张作霖，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张作霖为堵他的嘴，汇款30万给他，他收到后立即退回，还对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张大帅”的部队开进北京，通缉名单上邵飘萍的名字赫然在目。为此，邵飘萍不得不躲进六国饭店，而奉系军阀用2万块钱和造币厂厂长的

唯一邀请张季鸾坐在首席，两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当时在座之人颇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感。

当代学者研究档案获悉，1940年，张季鸾曾受命蒋介石前往香港与日本人谈判议和，虽因种种原因导致谈判中途夭折，但仍可见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倚重。而张季鸾曾特意交代王芸生：“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张季鸾说：“我的人生观很迂腐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中国记者的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背后是一股精气神。弹指一挥间，记者从现代走进当代，新中国建立后，记者行业发挥了更加巨大的作用，可各种各样的改变也在这些年里悄然发生。

站在这个“人人都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骂记者15分钟”的寒冷冬天，回顾行业的荣耀，看看先辈们开疆拓土的过去，我们可以感到一股温暖。从“最不适宜人类的工作”的悲叹里抬头，出发寻找弥合行业与社会裂隙的方式。

舆论大V梁启超 “举国趋之”



条件收买了他的一个朋友，将他骗出饭店，逮捕枪决。邵飘萍不仅是新闻记者，还在多所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他在北大教书时，毛泽东是其中一名旁听生。听过邵飘萍的新闻学课程后，毛泽东深受鼓舞，在民学会发言时说：“我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

当然，后来毛泽东既没有做成老师，也没有做成记者。不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华社好好过了一把记者的瘾，写下了不少新闻稿，像《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等消息和《别了，司徒雷登》等评论，曾风趣地自夸为“新华社最好的记者”。

五四时期，报纸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接受权贵“馈赠”的不止邵飘萍。傅国涌在《追寻失去的传统》中说，与邵飘萍齐名的著名报人林白水，“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骂，绝不恭维’，权贵们又怕他，又恨他。当时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对总编辑胡政之则‘每月送到三、四百元，从未间断’。”

张季鸾 享国士礼遇



本文参考书目：

《中国新闻社会史》 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

《追寻失去的传统》 作者：傅国涌

《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 作者：王建朗

《张季鸾庐山三主谏蒋介石》 作者：贺伟

感谢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咏梅